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及其政策化的跨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范世涛

摘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一命题最初在1981年由古托夫斯基与薛暮桥提出,经薛暮桥多方努力和国际化交叉印证过程而进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提出者和主要倡导者的名字,这一命题可以简称“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该共识的提出和政策化过程表明,国际决策咨询与合作有效提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开展全球视野的跨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侧面。

关键词:邓小平;价格改革;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中德合作;跨国经济思想史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6.016

邓小平高度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①。这份历史性文件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要求“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②。这正是邓小平称赞的“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之一。

追溯“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一“新话”的提出和政策化过程,它最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904—2005)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顾问、联邦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在1981年达成的共识,经薛暮桥多方努力和国际化的交叉印证过程而进入《决定》。根据主要提出者和倡导者的名字,这一命题可以简称“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其政策化标志着价格改革成为中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中心议题。

一、薛暮桥和中央决策议程中的价格体系调整与改革(1962—1980)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的产出和投入数量计划是经济运转的中心,价格由中央计划机关严格控制而不是买卖双方自由决定。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机制发挥中枢作用截然不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致力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捷克斯洛伐克在副总理奥塔·锡克(Ota Sik, 1919—2004)领导下,中央计划机关在计算合理价格基础上先调整

感谢薛小和允许使用薛暮桥未刊手稿,感谢张卓元、吴敬琏接受本文作者访问。感谢吕丽云(Wendy Leutert)、张清勇、陈月圆、刘宜、张雅婷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刘宜的贡献尤其重要,其中包括其个人收集的古托夫斯基文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薛暮桥年谱(1952—2005)”(21FJLA002)。

作者简介:范世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fshitao@163.com)。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70—571页。

后放开,允许价格自由浮动平衡供求。但这一改革随布拉格之春的结束而中断^①。匈牙利1968年改革结束了指令性计划,价格改革则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尚未建立真正的市场定价体系^②。针对苏联和东欧经济现实,匈牙利经济学家建立了以数量调节为中心的短缺经济模型。价格调节或者在经典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起作用,或者只是部分发挥作用,这分别对应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前及改革过程中的情况^③。

(一)中国价格体系的调整与冻结(1962—1977)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起来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机制也随之转为指令性价格,产品和服务的定价由国家统一规定。1962—1967年,国务院设立全国物价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物委”),统一管理全国物价工作。薛暮桥被任命为全国物委主任兼党组书记,他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薛暮桥早年曾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短期任职,其间在陈翰笙(1897—2004)指引下进入经济研究领域^④。但他并不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家,而是“深入参与制订实际经济政策的行动派”^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战,创造了“山东货币奇迹”^⑥;1947年后全程参与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和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工作^⑦。他是国家计委创始委员,后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职务。正是在参与领导中国计划工作过程中,薛暮桥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体制的弊病,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谋求解决之道,因而成为中国价格体系调整的主要组织推动者,继而成为中国价格改革最有力的倡导者。

在1962—1967年领导全国物委期间,薛暮桥面临稳定物价水平和物价体系合理化两个主要政策目标。在这两个政策目标中,他先后采取“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动,逐步调整物价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形势下,实行稳定与调整并重的物价工作方针”和“全面调整”的策略,优先解决物价水平稳定问题,在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后,再将工作重心转向价格体系的全面调整,以求计划价格体系的合理化^⑧。

其中,全面调价方案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结合进行。薛暮桥为此执笔起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调整物价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并在1965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但是,除了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增加职工补贴计划得以实施,这一全面调整物价方案后被搁置下来。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方必须根据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切实加强市场物价的管理^⑨。此后全国物价体系虽有微调,但总体上长期冻结,薛暮桥领导的全国物委则在机构精简过程中并入国家计委。

(二)从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到筹划物价管理体制彻底改革(1977—1980)

在物价长期冻结期间,国内外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物价体系不合理现象较10年前更加严重。

① 吴敬琏、荣敬本、冯文光等:《奥塔·锡克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81年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报告》,《经济研究资料》1981年增刊。

② Kornai J.,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6, 24(4), pp. 1687-1737.

③ 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黄卫平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④ 范世涛:《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⑤ 《外国驻北京人员注意薛暮桥的著作》,《参考消息》1980年4月16日,第2版。

⑥ Rohrrough E., “Currency Battle in Communist-Held Areas during War Recounted”,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6, 101(6), p. 115.

⑦ 范世涛、薛小和:《薛暮桥年谱:1904—1952》,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⑧ 薛暮桥:《我国物价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

⑨ 《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现行开支标准及有关文件汇集》,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局编印,1971年,第8—12页。

作为“三五”计划全面调价方案的主持制定者,薛暮桥继续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尤其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

1977年薛暮桥致信国家计委领导,指出工业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快,成本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成本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很大。农产品价格偏低,社队必须采取“以工养农”“以副养农”方针,这是工农业产品价格不合理的结果。为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需要大大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计委领导对这一建议作出批示,要求商量解决问题^①。随后,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加强物价工作的报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两次批示,一方面指出报告是调查研究性的,整个物价不作大的变动;另一方面强调物价大权归中央,不得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同意成立国家物价总局,由国家计委代管^②。1978年2月,国家计委领导委托薛暮桥组织有关同志完成《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初稿)》,报告指出:粮食生产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旧的剪刀差缩小了,又产生新的剪刀差,工农业品价格还有必要继续调整。20年来我们不断强调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对他们的物质利益不够关心。如果增产不增收,怎么能够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呢^③?薛暮桥还在国家计委干部会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价格背离价值的可能性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规律不能自发调节;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清楚的,要做到逐步缩小剪刀差,逐步做到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但实际情况是剪刀差没有缩小。物价问题堆积如山,他认为要从理论上研究,全面安排,分期分批逐步解决^④。这些报告内部印发,可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先声^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的重要标志,改革尝试随后在各地、各部门广泛展开。薛暮桥除了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还作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组负责人(1979—1980)、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1980—1982)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80—1985),直接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和方案设计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将中国物价体系的调整和改革直接带入中央财经决策议事日程。

1980年夏,薛暮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关于调整物价和物价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指出现行计划价格已经成为各种改革的绊脚石。改革物价管理体制,不应采取修修补补办法,应当老老实实承认目前的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逐步完成物价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打破所有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价格的老框框,赋予企业定价权。价格形式可以实行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等多种形式。国家物价管理部门主要统一规定制订物价和调整物价的方针政策 and 法令,监督指导市场和物价,而不是一一审批^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报告后议定,物价调整的方针是对生产资料价格作全面合理调整,并尽可能争取早日施行。1980年下半年和1981年一年准备,打算于1982年开始实行。

依照薛暮桥的设想,价格体系调整和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而整个经济改革的构想则反映在他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持制定,在1980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印发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以及《薛暮桥同志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⑦。《初步意见》开宗明义,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

① 《薛暮桥致顾明、段云并报余秋里的信》,1977年7月5日,手稿,薛小和藏。

②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8—499、505页。

③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整理:《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初稿)》,1978年3月7日,薛小和藏。

④ 《国家计委薛暮桥同志的报告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记录稿)》,铅印本,薛小和藏。

⑤ 《薛暮桥文集》第7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页。

⑥ 《薛暮桥文集》第8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86—87页。

⑦ 《薛暮桥同志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1980年9月,无锡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A1-3-207。

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①。但会议并未就此作出正式决定,各地只是将《初步意见》和《说明》带回翻印,作为地方类似会议的文件和政策参考。

由于财政赤字和透支发行带来物价水平上涨压力,1980年12月中央采取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管制物价,议价不准上升,只准下降^②。但薛暮桥坚持认为,物价改革完成是“体制改革就可以说是大体完成”的主要标志之一,结合制订国民经济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制订物价调整和改革的中长期规划仍然是必要的^③。

二、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的建立(1981年9月)

正是在筹划中国价格体系调整 and 改革时,薛暮桥邀请国家计委顾问、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访问中国,两人就价格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建立了共识。

(一)古托夫斯基:中国国际决策咨询机制中的联邦德国经济学家

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国早在1979年即引入国际决策咨询机制,聘请政策经验丰富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Ōkita Saburo, 1914—1993)、向坂正男(Masao Sakisaka, 1915—1987)^④和联邦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Armin Gutowski, 1930—1987)担任中国经济政策顾问。之所以聘请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两国的战后经济增长表现最为突出,是我国重点学习借鉴对象。而这几位顾问也不负所望,均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杰出贡献^⑤。

古托夫斯基担任我国政府的经济顾问,缘于当时联邦德国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总理推荐。此前古托夫斯基曾任基森大学教授(1967—1970),主讲国民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1970—1978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兼联邦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委员。该委员会每年秋季呈交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寻找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的有效途径。委员会由5名经济学家组成,因此也被称为“五贤人委员会”。1978—1987年,古托夫斯基任汉堡大学教授,兼汉堡世界经济文献研究所(Hamburgisches Welt-Wirtschafts-Archiv)^⑥所长。施密特推荐古托夫斯基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显然考虑了他的职业履历和当时的身份^⑦。

古托夫斯基参与中国经济政策咨询的正式名义是国家计委顾问。在联邦德国文化外交机构歌德学院资助下,他与工作助手沃尔夫冈·克兰纳尔(Wolfgang Klenner, 1942—)博士于1979年6月25日至7月14日,应邀第一次访问中国,考察了北京、大庆、齐齐哈尔、上海、无锡、常州^⑧。

访问期间,薛暮桥与同事主持了古托夫斯基的报告会,并与古托夫斯基座谈,请他提出意见和建议^⑨。古托夫斯基写道:“我能有资格参与这些讨论,并不是因为我对计划程序或中国经济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被视为一种国民经济体制的学术代表,该国在经济几乎完全被摧毁后,在30年

① 《薛暮桥同志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1980年9月,无锡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A1-3-207。

②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1979—1985)》,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200—201页。

③ 薛暮桥:《再论经济结构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教研参考资料》1981年第6期。

④ Ōkita S., *Japan's Challenging Years: Reflections on My Life*,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1983, pp. 92-94.

⑤ 魏众:《改革初期的洋顾问》,《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

⑥ 该研究所2005年改名“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Das Hamburgische WeltWirtschaftsinstitut)。

⑦ 埃尔维因·魏克德:《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前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回忆》,祖卫、刘玉慈、周祖根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208—213页。

⑧ Gutowski A., “Anmerkungen zu den Entwicklungschancen Chinas”,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1980, 25, pp. 275-286.

⑨ 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待西德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简报(一)》,1979年6月30日。该简报为年度简报,编号为该年之序列(作者注)。

内成功地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东道主迫切希望得到一个批判性的评估。为此目标,他们给了我机会了解中国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许多集体和国有企业的成功与困难。”^①

古托夫斯基在访华报告会上重点介绍了联邦德国战后面临的道路选择问题。当时有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把螺丝拧得更紧和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两种主要观点,政府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联邦德国短短几年就走出了困境。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所讲的仅仅是提供一些参考。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晚年表示,这次报告“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古托夫斯基“对中国友好”,“他的演讲,使我国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广大干部,开始对市场经济有所了解,这也是思想上的‘突围’”^②。而“突围”正是李岚清回忆录的标题。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上批示:“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来往……”^③显然,中国对古托夫斯基的顾问工作比较满意。

在第一次访问结束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会见了古托夫斯基。除了表示感谢,还邀请他每年来华访问一次^④。此后,古托夫斯基多次访问中国,其中1981年8月24日至9月20日的访问是最重要的一次。

(二)薛暮桥与古托夫斯基建立中国价格改革共识

1981年古托夫斯基访华系薛暮桥邀请,筹备工作也由薛暮桥负责。在古托夫斯基抵达北京前夕,薛暮桥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商定向他介绍中国经济情况要尺度宽一点,说得深一点,数字不超过向世界银行提供的为准。不同单位角度不同,意见分歧可以作为个人意见提出来^⑤。这就为古托夫斯基提供了便利的经济决策咨询条件。

8月26—28日,古托夫斯基分别听取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报告中国经济情况。8月29日在国家计委外事局干部陪同下,与助手到武汉、上海、南京考察地方财政、金融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9月12日返回北京。9月14日、15日和18日,薛暮桥主持有关部门座谈会,古托夫斯基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意见和建议^⑥。

在座谈会上古托夫斯基是这样开始的:

薛暮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前言里边以及在他此后的著作里都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进行调整工作的同时,不应该把总的改革目标忘掉。薛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调整大体国内需要5—10年,如果不是说更长的话。薛暮桥先生指出,1976年以后,我们利用外资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项目,现在看来,当时利用外资的大项目多了一点,快了一点。当我在1979年6、7月份访华时,中国已经注意到这个错误了。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大规模削减了利用外资搞的大型项目。我认为这样一种削减是必要的、正确的。去年8、9月份,当我们第二次访华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调整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但)人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规划,都是在微观方面进行的一些零散的试验。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的这些局部试验和宏观经济之间到底存在怎样必要的联系……

① Gutowski A., “Anmerkungen zu den Entwicklungschancen Chinas”,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ts-und Gesellscha/tspolitik*, 1980, 25, pp. 275-286.

②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43—344页。

③ 转引自魏众:《改革初期的洋顾问》,《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

④ 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待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简报(五)》,1979年7月14日。该简报为年度简报,编号为该年之序列(作者注)。

⑤ 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待西德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简报(一)》,1981年8月30日。该简报为年度简报,编号为该年之序列(作者注)。

⑥ 严守:《西德古托夫斯基教授对我国财政金融问题提出的建议》,《金融研究》1982年第2期。

根据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在进行调整工作的时候,不妨在宏观经济方面多花些力气,比方说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国家财政收支,特别是货币和物资供应的平衡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目前放弃在微观经济方面的试验。完全相反,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希望进一步发挥供求关系这个因素的作用,也就是薛暮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么对此应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余地……现在谈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该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就是物价体系问题。^①

接下来,古托夫斯基对物价、财政、金融、企业财务、通货膨胀控制、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等问题提出系统的意见。他表示赞成薛暮桥关于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意见,认为中央银行一方面要独立于业务银行,另一方面也要独立于政府^②。后一意见显然源于联邦德国中央银行独立于联邦政府的经验。

薛暮桥主持座谈会的同时,现场笔记了古托夫斯基所提意见的要点,其中包括:“今后几年中国面临重大问题,即物价体系,这有关中国改革的成败。”^③这与现场翻译记录有关内容一致,表达则更为精练,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高度近似,可以视为薛暮桥和古托夫斯基就此建立共识的时间。

9月18日晚,谷牧副总理再次会见古托夫斯基。谷牧在会见中指出,古托夫斯基谈的问题正是我国在经济工作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银行问题。我们想除了少数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一般讲又不是周转快、见效快的项目(如铁路、港口、矿山等),采取由国家拨款的方式,其他都拟逐步改为银行贷款。由于政治体制不同,我们未考虑银行独立于政府,但考虑建立一个权力比较大的中央银行。古托夫斯基在会见中表示,希望今后的交往方式改为中方先把遇到的问题用书面形式寄给他,他把答案寄来,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再来北京谈,时间不用很长,也不需要去外地了。这样做会更有效。谷牧表示合作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同薛暮桥同志保持联系^④。

在古托夫斯基此次访华影响下,薛暮桥起草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认为,“过去我国的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微观经济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很好地同宏观经济配合”^⑤。文中提要介绍了古托夫斯基的意见:

西德著名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最近在调查了我们的体制改革以后,提出一些看法。他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微观经济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很好地同宏观经济配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过时的、僵化的价格体系;利用市场机制要善于发挥税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现在不重视税率的调整,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对信贷发挥调节作用的中央银行,还不善于利用利率来控制信贷的膨胀。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只考虑企业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必须用经济立法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否都会考虑国家的利益,值得怀疑。这些意见,值得我们重视。^⑥

薛暮桥此前已经提出设立中央银行和改革税制的意见^⑦;他还将价格改革带入中央财经工作日程,并视之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之一。他明显将自己的关切作为此次古托夫斯基访华的主要交

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古托夫斯基教授所提咨询性意见》,1981年9月14日。

② 国家计划委员会:《古托夫斯基教授所提咨询性意见》,1981年9月15日。

③ 《薛暮桥会见古托夫斯基笔记》,未标注时间,薛小和藏。从内容看写于1982年9月14日。

④ 国家计划委员会:《谷牧副总理会见古托夫斯基一行》,1981年9月18日。

⑤ 薛暮桥:《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⑥ 薛暮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1981年9月,铅印,薛小和藏,第2—3页。《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将该文时间标注为1981年11月,并删节了古托夫斯基访华提出的意见。

⑦ 《薛暮桥文集》第8卷,第128—146页;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改革银行体制的几点意见》,1980年11月3日,铅印,薛小和藏。

流议题。古托夫斯基1980年已经注意到价格改革,但在当年发表的文章中只是说:“价格或其上下限基本上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设定。但允许企业利润成为衡量绩效的主要指标,并一定程度上将利润反馈给生产者很有必要。”^①此次应邀访华有助于他更清晰地定位价格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过时的、僵化的价格体系”。这一命题一经古托夫斯基提出,薛暮桥立即给以重视和响应。除了现场笔记和上面引用的内部报告,他还在一份1982年6月的报告中写道:“奥塔·锡克认为,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从调整物价开始;古托夫斯基也说,能不能改变过时的、僵化的物价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②这份报告印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陈云同志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以及张劲夫、宋平、马洪、廖季立等人。鉴于上述情况,如果遵循国际学术界惯例,用主要提出和倡导者的姓名指代这一命题,可以称这一命题为“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

三、薛暮桥与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的政策化

虽然薛暮桥是中国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古托夫斯基是我国政府正式聘请的经济顾问,他们就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一共识马上成为政策。事实上,其政策化过程较学界通常想象的过程更加复杂曲折。

(一)价格体系的局部调整 and 改革(1981—1984)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收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文,于1981年11月致信薛暮桥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各同志,认为“中央必须牢牢掌握调整物价之权”,让地方、部门有一定的调整价格自主权,“这可要很谨慎,因为这方面出了乱子,就是大乱子,是开不得玩笑的”^③。随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政府工作报告》删除了讨论稿提出的“现在,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又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很多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④。这意味着薛暮桥1980年带入政策议程的物价体系调整和改革被搁置。不仅如此,1982年经济政策转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薛暮桥所建议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商品经济方案也面临被批判的风险。而市场导向改革正是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不言而喻的基础。

在商品经济面临质疑的情况下,薛暮桥调整立场,不再强调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转向重新解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重点强调计划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价格体系调整和改革被看作“宏观”计划体制改革的首要组成部分。其实古托夫斯基在座谈会上,明确将价格改革视为“微观经济方面的试验”。但薛暮桥将价格改革纳入“宏观”计划体制改革,虽然与现代微观经济学不一致,却方便继续推动价格改革政策和理论研讨^⑤。

在政策层面,薛暮桥转向推进迫切需要的单项价格调整和改革。1982年,薛暮桥对《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草案提出意见,指出所有商品价格都列入分级管理范围是不可能的,数以万计的小商品必须允许自由定价。负责制定价格的机关,必须随时研究产品供需情况,及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对自发产生的价格,必须存利去弊,不能一概认为非法^⑥。正式颁布的《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吸收了薛暮桥的

① Gutowski A., “Anmerkungen zu den Entwicklungschancen Chinas”,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1980, 25, pp. 275-286.

② 《薛暮桥文集》第9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奥塔·锡克1981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吴敬琏、荣敬本参加接待工作。访华期间奥塔·锡克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价格改革经验。

③ 《梅行致薛暮桥的信》,1981年11月22日,薛小和藏。

④ 《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94—497页。

⑤ 1990年7月薛暮桥接受吴敬琏的建议,不再将价格改革视为宏观经济问题。

⑥ 《薛暮桥文集》第9卷,第260—262页。

意见。不久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160种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①。

除了放开小商品价格,薛暮桥还研究了纺织品价格问题。他建议提高棉布销售价格,同时大幅降低化纤布价格,以扩大化纤布的销路来代替棉布,多年限量供应的棉布可能敞开供应^②。这一意见在1982年10月被中央采纳,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和提高棉纺织品价格的通知,批准国家物价局的有关报告。纺织品价格调整成效显著,施行多年的布票制度不久取消^③。

在国际层面,薛暮桥继续与国外经济学家密切交流,讨论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改革议题。1982年,薛暮桥与刘卓甫、廖季立共同主持以中国价格学会名义主办、与世界银行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举行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薛暮桥在会上反复解释,放开价格的小商品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生产资料除计划分配外,计划分配外的部分准许议购议销,后者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实行计划价格的大商品的价格也在一定范围内准许浮动,说明市场调节的作用正在不断扩大^④。以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1921—2007)为首的考察团回国后提出了中国改革建议,指出价格改革最主要的是增进价格的灵活性,扩大自由定价范围,对计划定价部分扩大基准价格浮动范围,而中国的基本原料及能源价格需要上调^⑤。这与薛暮桥此前的意见高度一致。

在国内学术界,薛暮桥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无锡召开的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借助评论孙冶方提出的著名命题“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论证价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策略,活跃学术界价格改革研讨氛围,争取更大范围的关切^⑥。

薛暮桥还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书面发言《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有针对性地解释现实物价问题^⑦。这一书面发言随后在《瞭望》杂志、《理论月刊》和《新华文摘》公开刊登,进而被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报刊广泛转载^⑧,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二)重申“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4)

在广泛研讨、局部价格改革实践和说服工作的基础上,薛暮桥在1984年重提与古托夫斯基3年前达成的共识——“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6月20日,薛暮桥致信国务院总理,信中说:前两月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对我说:他不理解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对调整物价如此害怕。物价与税率相比,物价可以比较灵活,随时调整;税率应当比较简单,比较稳定。过去我所接待的外国专家,都有类似的想法,说中国物价如此不合理,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原来我们设想,通过扩大指导性计划以增加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调整不合理价格体系,从而形成整个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是担心物价普遍上涨和人民不满,因此中央需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其实物价普遍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只要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基本平衡,物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1978—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33、240页。

② 《薛暮桥文集》第9卷,第293—299页。

③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稿》,1991年,手稿,薛小和藏。

④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稿》,1991年,手稿,薛小和藏。

⑤ 任涛整理:《布鲁斯等国外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

⑥ 薛暮桥:《真理是不怕任何人批评的——薛暮桥在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9月19日,第2版。

⑦ 薛暮桥:《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参阅资料(八),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1984年5月18日,无锡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F001-1984-002-0128-0461。

⑧ 薛暮桥:《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瞭望》1984年第29期;《理论月刊》1984年第7期;《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光明日报》1984年7月31日,第1—2版。

价就不会普遍上涨。今年起,财政金融情况好转,生产商品供应丰富,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在这时候,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做好调整物价的准备工作,并对全国人民特别是经济工作干部进行教育,使大家认识调整价格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①。

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得到来华访问的海外学者看法的印证。7月5日,国务院总理会见美国经济学会美中经济学交流委员会主席(Co-chairman of the U. S.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至庄(Gregory C. Chow, 1929—)教授,邹至庄重点提出中国价格问题。随后,应国务院总理要求,薛暮桥会见邹至庄及其夫人,讨论中国价格改革。邹至庄事先阅读了薛暮桥的作品,薛暮桥则早在1981年就曾修改邹至庄《从企业效率谈价格规律》中译文,并批示印发领导同志和有关机关参考^②。事后邹至庄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与国务院总理的会见、薛暮桥发表的有关文章、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表明,“价格体制改革已经引起了整个中国的重视”^③。在邹至庄之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 1921—1999)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价格改革涉及劳动、工资、通货、国家补贴等方面,但非改不可,因为改革价格是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④。

时任匈牙利副总理兼经济委员会主席马尔亚伊(Marjai József, 1923—2014)也在访华时建议中国加快价格改革。正如科尔奈(János Kornai, 1928—2021)教授所指出的,匈牙利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国界,其经验影响了中国改革,也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思想^⑤。中国财经决策层和经济学界1979年起密切关注匈牙利改革,不止一次派出代表团了解其改革经验^⑥。1984年4月匈牙利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部署。因此,马尔亚伊8月20日起为期12天的中国访问得到中国政策当局的高度重视^⑦。国务院总理会见马尔亚伊时,马尔亚伊明确表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中国现在有此条件,正处在改革价格的黄金时代,而匈牙利则错过了机会^⑧。

在得到多方印证共鸣的条件下,薛暮桥8月24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回顾和前瞻——为国庆三十五周年而作》一文。文章以权威而确定的语气表示,把国营企业搞活,必须相应地进行整个国民经济范围的体制改革,而“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新华月报》杂志全文转载。其中的“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⑨命题也随之广为传播。

8月25日,薛暮桥再次致信国务院总理,提出《关于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意见》,指出

① 《薛暮桥文集》第10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② 邹至庄:《从企业效率谈价格规律》,《体制改革简报》第2期,1981年4月5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薛暮桥修改译文的宗旨是使文字更通俗易懂,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③ 《薛暮桥会见美国政治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人民日报》1984年7月14日,第4版;朱杏清、陈翰圣:《曾任台湾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谈中国经济 价格体制改革已引起整个中国重视》,《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7月30日,第1—2版。

④ 胡后法:《国际知名中国通鲍大可先生高度评价 中国改革实事求是方向正确 价格改革关系整个改革成败 难度最大条件成熟迟早得改》,《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8月6日,第1版。

⑤ Kornai J., *By Force of Thought -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6, p. 273.

⑥ 于光远、苏绍智、刘国光等:《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

⑦ 向阳整理:《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谈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1期;陈学燕:《中匈关系的喜人进展》,《国际问题资料》1984年第18期。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33—538页。

⑨ 薛暮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回顾和前瞻——为国庆三十五周年而作》,《红旗》1984年第18期;《新华月报》1984年第9期。

计划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过去的价格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目前的情况,必须大胆进行改革^①。他还应邀出席8月31日和9月1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稿提出修改意见^②。9月初,国务院领导开始谈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表明信中的意见得到了认同和支持。

(三)一致同意决策使价格改革进入改革中心议程

但是,上述意见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还需要中央核心决策层取得一致。为解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国务院领导9月9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主要问题之一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比计划指标灵得多,这已为多年来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价格不合理,必然给人们以错误的信息,引导企业走上错误的方向……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封信中提到“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这隐含了古托夫斯基的建议;信中还提到马尔亚伊在会见中提出的意见,认为他的“这个论点值得重视”^③。

邓小平对这封信率先批示:“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④陈云复信表示,纺织品调价是“成功的例子”,“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⑤。李先念表示,“要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很需要把价格体系改革好。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⑥。这表明信中提出的意见得到核心决策层的支持。

核心决策层取得一致后,薛暮桥仍密切关注学界的讨论,尤其是华盛顿大学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 1946—)的意见。拉迪在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表示,中国更好地利用市场关系把生产搞活,首要问题是价格问题。现行价格体系不合理,一方面是因为50年代建立计划价格体系时就不合理,一直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原材料价格在增长,中国价格体系却一成不变,拉大了与世界价格的差距。现在是中国价格体系调整的“黄金时代”。拉迪还表示,中国财政收入增加很慢,主要原因是物价补贴负担过重。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当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取消物价补贴,减轻国家负担^⑦。薛暮桥将关于拉迪发言的报道推荐给包括吴敬琏在内的经济学家。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与《初步意见》高度一致。《决定》强调,“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⑧。这标志着薛暮桥-古托夫斯基共识正式转化成为党中央的政策。

全会闭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薛暮桥专就《决定》中的“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做长篇解释性发言^⑨。这从侧面反映出薛暮桥在推动这一命题成为中央政策时发挥的

① 薛暮桥:《关于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意见——1984年8月》,《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8—193页。

② 《给薛暮桥的会议通知》,1984年,薛小和藏;《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决定(四草)》,1984年8月25日,薛小和藏。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33—538页。

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编:《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12页。

⑥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7—268页。

⑦ 陆明丽:《拉迪博士认为中国再不调整价格体系就会妨碍整个经济改革 当前是中国价格改革的黄金时刻》,《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第8版。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70页。

⑨ 薛暮桥:《在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的发言稿》,1984年10月30日,薛小和藏。

关键作用。古托夫斯基则并不知道自己在1981年在薛暮桥主持的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现在成为中国政策。他在1985年国际经济学会基尔会议的论文中只提到多次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接受关于怎样在中国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因素的政策咨询,包括银行体系、税制和特区问题。论文既未提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也未提及“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①。

四、结束语:经济转型中的思想开放和跨国智力合作

现有学术文献尚未注意薛暮桥和古托夫斯基在“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命题提出和政策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中文学界认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一命题“是在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提出来的”^②。英文学界注意到中国迈向全球性国家过程中改革者与西方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③,马丁·阿尔伯斯和韦一还特别注意到古托夫斯基曾以顾问身份在中国工作,但并未说明古托夫斯基对中国改革的具体贡献^④。

本文追溯“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命题的提出和政策化过程,指出早在1981年9月,薛暮桥与古托夫斯基已经在北京就此达成共识。从中德两位决策顾问的共识转化为中央政策,还有赖于成功的政策试验与活跃的交流研讨,薛暮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但并非唯一的作用。因此,邓小平称赞《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其中的价格改革内容建构过程清楚表明,这一政治经济学不仅包含以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经济改革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古托夫斯基这样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论者、邹至庄这样的计量经济学家、鲍大可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尔亚伊这样的匈牙利改革者的智慧。这些因素相互印证和强化,终于使价格改革突破成见和阻力,以“新话”的方式进入中国改革议程的中心。

本文对于转型研究和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方法论启发意义。邓小平曾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邓小平要求,必须将引进智力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方针,长期不懈地贯彻执行下去^⑤。正因为这样,中国改革中引入了国际化决策咨询机制,而中德两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古托夫斯基卓有成效的合作正是这一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案例。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际侧面,有必要积极开展全球视野的跨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这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是有意义的。

① Gutowski A., Merklein R., “Restructuring Incentiv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alassa B., Giersch H. (eds), *Economic Incen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p. 329-347.

② 张卓元:《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汤国钧:《十年来我国关于社会主义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的讨论述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张卓元不止一次撰写关于价格体系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的论文。在接受作者与吕丽云访问时,他表示“价格改革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外的成分”。这与《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一书看法一致。参见张卓元:《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10、236—243页。

③ Gewirtz J.,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Albers M., *Britain, France, West German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9—1982: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China’s Great Trans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96-197; Weber I.,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147.

⑤ 参见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360页。

**“Price Reform Is the Key to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Economic System”**

**—A Study on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olicy Incorporation of the Xue-Gutowski Consensus**

Fan Shitao

(The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P. R. China)

Abstract: Price liberaliz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In 1984,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2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opted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stating “reform of the price system is the key to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economic system.”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price liberalization became central to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is paper traces the proposition that “reform of the price system is the key to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bserving that as early as September 1981, Xue Muqiao and Armin Gutowski had reached a consensus in Beijing that can be called the “Xue-Gutowski Consensu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two Chinese and German policy advisers’ consensus into CPC policies relied on successful policy experiments and active discussions, with Xue playing a major but not exclusive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ce liberalization becoming central to China’s reform polic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rice liberalization policy includes efforts by Chinese Marxist economists and economic workers represented by Xue Muqiao, but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wisdom of German social market economists like Armin Gutowski, econometric economists like Gregory Chow, and Hungarian reformers like Marjai József. These mutually-reinforcing factors enabled price reform to break through stereotypes and resistance and become central to China’s policy agenda in a “new discourse” way. This paper is methodologically significant for studies of trans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Deng Xiaoping once pointed out: in pursuing modernization, we lack both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e should have no qualms about spending a bit more on recruiting foreigners.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y stay here for a long time or a short time, or just for a single project. After being invited, they should play their role well. They are willing to help us in our work. He call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lligence to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 and implemented unremittingly over the long term. For this reason China’s reforms introduced an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mechanism, and the fruitfu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German economists Xue and Gutowski i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its effective operat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China’s economic policy-making, and more actively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though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Keywords: Deng Xiaoping; Price reform; Xue-Gutowski Consensus; Sino-German cooperati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责任编辑:王玲强]